

長沙文史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委员会
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 编

17

2004.12

主 编:郑兆欣

责任编辑:梁小进

编 辑:江德兴 张彩霞

长沙文史——第十七辑

长沙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编

开本:大 32 开

印张:7

字数:18 千

印数:1-1500

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 2004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湖南省内部资料准印证:长新出准字(2004)第 75 号

目 录

忆毛主席四次畅游湘江	尹渊泉(1)
忆胡锦涛同志视察黄兴镇	罗 雄(6)
参加解放台湾战役准备的回忆	王哲富(11)
我在“文革”初期的经历	胡瑞采(14)
我所经历的长沙“八一九”八中事件	丁克思(26)
怀念曹瑛、阎子祥同志	朱铁蓉(31)
曹公耀材家传	曹国果(35)
我所知道的黄昌年先生	李芸青(44)
回忆伯父周大荒先生	周靖江口述(48)
祖父谭道源二三事	谭 正(52)
回忆祖父郭一予	郭立成(57)
祖父廖模传略	廖小芳(64)
上世纪一个普通农民的经历	江德兴(66)
大围山垦荒始末	李修能(72)
九个月的大围山生活	邱明明(83)
战斗在大围山的青年志愿垦荒队员	黎梦玉(85)
难忘的岁月	戴凤午(87)
我所见到的长沙大火	薛祚先(89)

“文夕大火”中陈家垅报房的被焚	长沙电讯志编写组(91)
“文夕大火”中的长沙粮食行	李芸青(93)
忆唐生智的“两湖佛化讲习所”	翁平章(99)
忆和平解放时的在乡军官会	周伯纯(103)
解放初期长沙沿江棚户拆迁概况	李玉希(105)
集园补习学校追记	李迪明 熊家芎(109)
星沙忆旧	龚业隆(113)
长沙话旧	许伟明(117)
湖南烈士祠兴废史话	陈伯勋(121)
往事杂忆	陶英强(124)
避乱始末记——庚戌至辛亥	郭筠撰 胡卫平整理(127)
我所目睹的长沙抢米风潮 (英)梅瑞克·休勒特撰	郑朴译(132)
英国档案中的长沙抢米风潮史料	郑朴译(143)
美国驻长沙领事詹森报告书(三) (美)詹森	魏民译(161)
日本驻长沙领事馆辖区内情况的报告(三) (日)清水八百一	吴旭东译(173)
函请更正	钟叔河(218)

忆毛主席四次畅游湘江

尹渊泉*

毛主席对游泳的兴趣一直十分浓厚。早在30多年前,他在第一师范读书时,湘江就是他大显身手的地方,并为此写了许多诗词,抒发了一个革命者的豪迈气概。解放后,毛主席回到湖南视察工作时,又多次畅游过湘江。由于我当时任长沙市公安局原水上分局派出所所长,所以在毛主席五十年代四次畅游湘江时,我都是按上级命令以一个划工和工作人员的名义,组织公安号汽艇和木划子,围绕在主席身边,驾着划子并多次挽扶主席上下船只,担负着贴身的安全保卫工作。这是我参加工作数十年所担负的最光荣、最有意义的工作。现事虽已过近50年了,但回忆当年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第一次是1955年6月20日,又恰是我与阳金玉同志新婚的日子。由于当时工作很忙,我不敢也未向上级请婚假,只好利用星期六(6月18日)的晚上在所内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请大家吃了一点喜糖。新房就是我的办公室兼卧室,仅换了一套新被盖而已,就算结婚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原想好好地放松一下。早饭后不久,突然接到市公安局的命令,要我亲自到水上各单位挑选最好的木划子6个,选调政治上最可靠、驾划子技术最优良且又会游泳的人6-8个,同时要准备两米多一点的竹杆两根,上面用红布条扎一个一尺

* 尹渊泉,系长沙市岳麓区政法委干部,现已退休

左右的小圈圈,以及手巾、脸盆等日常用品。接命令后,我们想准备这些做什么?谁也摸不清头脑,又不敢问,只有无条件服从。因为保卫工作是非常保密的,不敢对任何无关的人讲。由于当天是星期日,通讯条件又差,人员都分散在各家各户,所以我只好骑着自行车,一家一户地去找人,一个一个码头去挑选划子。忙了整整一天,但还没有把人员、划子全部按要求集中在五一路原轮渡码头河边。

晚饭后,省公安厅李强厅长等省、市领导来所内检查落实准备工作情况。我如实向领导作了汇报。由于白天忙于工作,没有时间与阳金玉同志联系,晚上她照常来到所里。李强厅长见后,问我:“小尹,她是你爱人吗?”我说:“是的。”他说:“今晚我们有事情,这个床铺我们睡了,请她回娘家睡吧!”我送走阳金玉同志后,又骑自行车到各单位逐一落实了白天还没有落实的工作,又忙了一个通宵,人很疲惫。回到所里,只见到李强等省市领导都挤在我床上横躺着,打了一下盹。

20日清晨,春江水暖,阳光灿烂,在省、市领导的指挥下,公安号汽艇和划子、人员以及手巾、脸盆、竹杆、茶杯等都全部落实好了,并将汽艇、划子开到原新河码头待命。

上午8时许,由原市轮渡公司的建湘号轮船拖着木划,向湘江上游开去,不久便在大托铺机场河边停了下来。9时许左右,身材魁梧、身着兰色中山装、脚蹬黑皮鞋的毛主席雄姿英发,在公安部长罗瑞卿、省委书记周小舟、省长程潜等的陪同下,健步登上了建湘号轮船。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又是以驾划子工人的身份直接担负着保卫毛主席畅游湘江的安全,大家都决心让他老人家玩得痛快、舒适,以实际行动报答毛主席。这时我们也才知道原准备的小竹杆和毛巾等东西都是为游泳而准备的。

当轮船由河边开到河中时,毛主席身着游泳裤,扶着轮船上的小铁梯下到水中。他用水拍拍胸前,即潜入水内,几分钟后才浮出。

水面,然后自由自在地时而侧游,时而仰泳,有时又上我的划子休息片刻。我们见到毛主席面容慈祥,和蔼无比,又是那样熟悉。他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用浓厚的家乡口音与我们交谈,使我们原来紧张的心情,变得无拘无束。我们也大胆地问主席:“您老为什么老是仰泳?”他回答说:“咯也不晓得,咯就是休息。”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毛主席从大托铺机场河边一直游到水陆洲头,全程数华里。在即将靠岸时,河边有一对中年夫妇驾一只小木船向上行驶,看见我们几只小划子,回绕在一个游泳的老人周围。他们夫妻伸着头向老人望了又望,似乎认识又不认识。还是那妇女急中生智,拿了船仓里挂的毛主席像与老人对了像,结果发笑了,这不是毛主席吗?她双手捧着照片,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然后才慢慢离去。当船停靠在水陆洲小河赵子港码头后,毛主席仍毫无倦意,在省领导陪同下,改乘汽车到岳麓山去了。直至下午六时,我们得知毛主席改乘汽车回省委去了,才返航回到五一路轮渡码头。

第二次是1957年9月8日。那天正好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我们又如前一样,组织了公安号汽艇和6只小木划与长沙市轮渡公司的轮船,一清早就停靠在长沙机场附近的河边。11时许,毛主席和中央、省、市一些领导来到了轮船上。那天天气晴朗,但气温较低,给游泳带来了不少困难。但毛主席游泳的兴趣很浓,吃过中饭稍事休息,大概下午一时许,就下水游泳。他一到我的划子上,就问:“你们吃了月饼没有?”当时,我们一门心思在作准备,竟忘了是中秋节,只好连忙答道:“吃了,吃了。”那天湘江水位低,流速快,没多久就游到橘子洲头。毛主席指着原来的洞庭宫问我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庙?”我们说:“不知道。”他随即就给我们讲起了洞庭宫和橘子洲的来历。这次保卫任务完成后,我们每个工作人员都领到了上级送的两个月饼和两个梨子。我们好久都舍不得吃,总想留作纪念,因为这是一生中得到的最珍贵的食品。

第三次是1959年6月24日下午。那天，毛主席从机场附近上船下水游泳后，游到水陆洲头小河，坐在我的小划子上。毛主席示意要上洲去看看，于是工作人员让毛主席穿着睡衣坐着小划子由我们挽扶上洲，到了橘子洲的菜园坪里。毛主席坐在坪里的一条木高凳上，询问菜农的生产生活情况。谈到高兴处，他指着周小舟同志问菜农：“你们认识他吗？”菜农说：“不认识。”毛主席幽默地说：“他是绣花姑娘。”大家都笑了。当群众看见毛主席平易近人，一个中年妇女对毛主席说，“毛主席，我家喂了几头大猪，请您去看看。”反复提了两次。毛主席说“好，好”。这就急坏了我们工作人员，我只好跟着那妇女用手将养猪场室内窗户上的蜘蛛丝撕掉，才让毛主席在窗户外看了看猪。那时又围来了一些小学生在毛主席周围。当时的校长便急中生智，与工作人员交涉，请毛主席到学校看看。毛主席听后说“好，好”。于是学生全部回到学校，很整齐地站在那里欢迎毛主席的到来。当毛主席谈笑风生健步走进校门时，学生的队伍中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使整个学校沸腾起来。毛主席在学校与师生谈了一些情况，并与学校师生合了影，然后才离开。从学校出来，他边走边对周小舟同志说：“娃娃们有势力，一下子就把我们围住了。”不久，毛主席就上了轮船。洲上的群众自发起来欢送，直到轮船划子等看不见了，还依依不舍地站在码头上久久不肯离去。

第四次是1959年6月26日。这天下午5时左右，毛主席从岳麓山方向乘车到溁湾镇轮渡码头的趸船上，一出车门便问罗瑞卿部长，“现在是什么时候，有时间吗？我游一下好吗？”罗说，“还有时候游吧！”毛主席由于游泳兴趣极浓，就在趸船上将皮鞋脱了，换了拖鞋，上了轮船。轮船马上向湘江上游开去，直到洲头时，在轮船才发现毛主席的皮鞋，脱掉在趸船上未拿。于是我开着公安艇回到趸船上来拿鞋子。当时我们年轻好奇，还反复把毛主席穿的黑皮鞋看了又看，看是否有特殊材料，也试了试脚，有多少码

子,以作为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的荣耀。这次游泳的不同情况是,许多群众知道毛主席在长沙畅游湘江,估计毛主席还在长沙。6月26日下午6时许,还是这些轮船、划子、人员浩浩荡荡从湘江上游下来,慢慢停靠在中山西路原汽车渡口码头。那时码头上在搞仓库基建,来往群众都想看看是不是毛主席又来了。大家伸着头望着轮船上,想看个结果。毛主席乘坐的轮船停在汽车渡口趸船边,船与汽车趸船中间的汽车相隔实际只一米多,但由于毛主席身材高大,刚一下轮船群众就看见了,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听后不上汽车了,而是向码头上的群众招手。紧跟在毛主席身边的周小舟同志手拿着蒲扇,对毛主席说:“那是街上,今天是星期六。”示意要毛主席上车。而毛主席指着码头上的群众说:“他们不是在那里招手等我吗!我去看看!”于是中央和省委陪同的领导以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紧紧跟在毛主席的两边和前面,疏导群众靠边,让毛主席大步地从码头下面向马路上走去。而此时群众越来越多,数以千计。我为了挡住群众,阻了主席的路,所以急得后退,不小心踩了罗瑞卿公安部长一脚,罗部长望着我只好笑了笑。当时长沙市西区公安分局局长则高喊:“同志们,让一让,我们要保卫毛主席,给毛主席让路。”而周围的群众只是慢慢地边走边让路。当毛主席走到中山西路东向内进50米左右时,群众更多了。为了安全起见,罗瑞卿同志让司机打开车门,手放在车门上边,毛主席才上车,汽车才徐徐开走。群众热烈招手欢呼,向毛主席致敬。毛主席走后,他们仍依依不舍,迟迟不肯离去,口中不断地念道,“今天是我幸福的日子,因为我见到了毛主席”。

据了解,为了安全起见,后来在长沙电厂附近,修建了一个专用码头,供保卫工作之用。但后来因毛主席年岁已高,再也没有到湘江游泳了。

忆胡锦涛同志视察黄兴镇

罗 雄*

二十年前,辛亥革命元勋黄兴和共和国大将许光达的故乡,处长沙市东乡、浏阳河东岸的长沙县高塘人民公社(今黄兴镇),掀起了一股群众文化热潮,频频亮相于新闻媒体。先后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共青团中央的表彰,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全国各地共青团组织和群众文化工作者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

1983年5月16日,经省、市、县各级团委的推荐,长沙县高塘公社团委出席了全国农村团组织整顿工作会议。我作为公社团委书记兼文化站长,受上级团组织的派遣,与共青团长沙市委宣传部部长吕滨同志一同参加了会议。5月17日,我代表高塘公社团委在大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当天的会议主持人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海峰同志,在主席台就座还有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刘延东。我发言的题目是《在农村青年求知、致富、娱乐上做文章》。5月21日,《中国青年报》以四分之一版的篇幅摘录刊登了我的书面发言。接下来的几天会议,胡锦涛同志作了一个主题报告,刘延东同志作了总结讲话。当天的休会期间,胡锦涛同志微笑着走下主席台,朝着我的座位走来(当时我坐在会场第二排中间,距离主席台很近),和蔼地叫一声“罗雄同志”之后即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你们农村基层团干部担子不轻啊,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点多线

* 罗雄,现为长沙市公路管理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长面广,人手又少。要做好团的工作,靠的就是团干部的创造力,靠的就是团组织的凝聚力,靠的就是团员的向心力。你们高塘公社的共青团工作很有特色,很有推广价值”。他停顿片刻,举目环顾主席台后又继续对我说:“听了你的发言,看了你的材料,印象很深,你为团干部如何做好新时期农村团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会议结束后,我准备专程去你们高塘公社看一看。”胡书记的谈话使我惊喜交加,一股暖流涌遍全身。会议期间,在休会间隙和去餐厅的路上,胡锦涛同志三次向我询问了高塘公社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后,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业科技推广普及情况、农村群众文化活动情况以及基层团组织工作情况。既问高塘公社的面积、人口、田亩,又问农民的收入和粮食产量。从联产计酬问到包干到户,从致富途径问到生活水平,和颜悦色之中充满了对农民的关心,浓眉大眼里透出的是对团员、青年、对少年儿童的关爱。胡书记每次提问,我都认真答复,如实汇报。

会议结束,胡锦涛同志在团省委书记游碧竹、副书记文选德,团市委书记王柏林、副书记励明安、宣传部长吕滨、研究室干事张克团,中共长沙县委副书记刘奇兵,团县委书记陈桂殊、副书记喻和平、王艳娟、干事刘义山,榔梨区委书记常松强、区长王明道,高塘公社党委书记黄正凯、副书记魏光辉等各级领导、有关方面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于5月23日上午9点专程来到高塘公社视察共青团工作和群众文化工作,直到下午5点结束。当天,领导安排我至始至终跟随在胡锦涛同志的身旁,负责介绍情况和回答有关问题。

公社文化中心是胡锦涛同志视察高塘公社的第一站。胡书记轻车简从,一身蓝色中山装,左上衣口袋别有一支“英雄”钢笔,脚穿白底黑面棉布鞋,给人一种庄重朴实、精神焕发、朝气蓬勃的感觉。下车没有休息,陪同人员跟随着胡书记直奔设在公社文化楼一楼的团委办公室。在团委办公室,胡书记审视四周之后,又走进

隔壁的青年之家活动室，胡书记认真浏览了张贴在墙壁上的反映高塘公社共青团工作状况的图表以及制度、规划等，翻阅了公社团委工作笔记。胡书记边看边移动脚步，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北京有个四季青人民公社，那里的共青团工作搞得很好，是全国的典型。你们的工作和他们很相似，但开展的群众文化活动比他们更丰富，更有特色！”

胡书记走出青年之家，又依次参观了设在二楼的少儿图书馆、阅览室、展览室。他饶有兴趣地与阅览室的青少年朋友和图书管理员邓斌老师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勉励正在阅览室读书看报的高塘中学学生：“你们到这里借书刊很方便，这里的条件很好，要珍惜时光，抓住机遇，勤奋学习，多读书、读好书。”阅览室内，顿时谈笑风生，充满着大家庭的喜庆气氛。离开文化楼，他又到公社大院南面的公社影剧院二楼参观青少年书法美术展览、学习张海迪板报展览、建党六十二周年辉煌成就图片展览等。他边看边说：“你们公社的文化工作贴近农民，贴近生活，文化活动健康有益，深受农民兄弟的欢迎，群众参与率高，团组织非常活跃，对青少年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是农村团工作和群众文化工作的好典型。”当胡锦涛同志缓步走出影剧院时，高兴地应团省委副书记文选德同志的邀请，与现场的陪同人员一起，在公社影剧院的台阶上合影留念。摄影的是相邻的仙人市公社文化站长廖术武同志。

中午安排在公社食堂就餐。吃完中餐，胡书记吩咐随行人员按每人六角钱四两粮票的标准交足了伙食费，随后走进了公社办公楼二楼东头小会议室，听取新任榔梨区区长、原任高塘公社党委书记王明道同志汇报情况。王明道同志称得上一名“老高塘”，他连续在高塘公社工作了十多年，对高塘公社的情况了如指掌，对群众文化工作如数家珍，是远近闻名的“文化书记”。下午，胡锦涛同志一行首先视察了公社机关大院对面的高塘中学（今黄兴中学），重点考察了应届初中毕业班25班。班主任陈海明老师带领

学生举行了简单的列队欢迎仪式之后，由 25 班团支部书记段先进同学汇报班级团工作。小段面对生平第一次见到的从北京来的大官，激动得一时语塞，说不出话来。胡书记亲切而又幽默地开导说：“别紧张，我们都是同行，我是团的书记，你也是团的书记，你是小书记，我是大书记，在同行面前简单讲一讲你是怎样做班级团工作的，你们班上是怎样开展红领巾读书奖章活动的。”亲切随和的讲话像春风化雨，润酥了每个同学的心田。段先进同学在胡书记的启发之下，作了流利的汇报。段先进的发言激起了千层浪花，同学们争先恐后地给“大书记”汇报思想，教室里响起的掌声、笑声、发言声一浪高过一浪。

陪同胡书记走出高塘中学，驱车四公里，来到了杨托大队部，参观了杨托大队利用“知青点”改建的青年之家。这里设有文化活动室、图书室、广播室，又瞻仰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兴故居，还去胜利大队青年橘园，参加了植树活动。胡锦涛同志与陪同人员一道，在青年橘园兴致勃勃地植树、铲土、浇水，并对在场的人们说：“植树造林是一件保护生态、造福子孙的大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动员全民参与，各级团组织要率领团员青年带头参加植树造林活动。”劳动了约半个小时之后，再到大队青年之家，听取了大队团支部书记邓菊秀同志汇报共青团工作。胡书记对胜利大队团组织团员青年创办图书示范户，开展义务植树、义务修路、为“五保老人”送温暖等活动非常赞赏：“这里的农村团支部工作非常出色，这里的农村团干部非常优秀，确实起到了党的助手作用。”胡书记在高塘公社视察工作的最后一站，专程去了胜利大队烟竹冲生产队图书示范户李中笑家。

李中笑是一位刚满 16 岁的农村女青年，初中毕业之后回家务农。她在公社团委、文化站和大队团支部的支持下，在长沙县图书馆辅导老师杨名山的指导和父亲李海兰同志（高塘公社文化站图书管理员）的帮助下，办起了图书示范户，并以写“读书心得”代替

图书租金的形式,免费向少年儿童提供图书借阅。她还组织少年儿童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开展红领巾读书奖章活动,写了很多读书心得。胡书记翻阅了悬挂在堂屋墙壁四周的读书心得之后,欣然命笔,在读书笔记本上写下了“向李中笑同志学习”的字样。1985年,李中笑同志被团省委推荐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并作为全国最年轻的代表,赴北京参加了表彰大会,受到了胡耀邦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胡书记在高塘公社视察了一整天。他那平易近人的风范,认真严谨的言谈,深入朴实的作风,和蔼可亲的笑容,使人终身难忘。他在公社文化中心图书阅览室参观时,我按照领导的意图,拿出事先准备的“文房四宝”请他题词。他郑重地回答说:“罗雄同志呀,团干部事事处处都要严格要求自己。我是团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兆国同志才是团中央的第一书记。我回北京后,专门向兆国同志推介你们的经验和做法,兆国同志有机会来你们这里视察时,请他题词比较合适。”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对胡锦涛同志的钦佩和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每当我回顾20年前的这段经历,总是激动不已。20年时过境迁,但胡书记的言传犹在耳边,胡书记的身教历历在目。我们这些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团干部,有幸聆听胡书记的教诲,深感受益终生。

2003年7月18日

参加解放台湾战役准备的回忆

王哲富*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党中央于同年12月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光荣战斗任务,就是解放台湾……”华东军区暨我第三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由副司令粟裕负责组织第九兵团开始进行解放台湾的准备。1950年1月,我第三野战军召开了师以上的政工会议,要求部队的各种工作以台湾作为战斗中心。同月,肖劲光就任海军司令,受命伊始,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配合我第三野战军准备渡海作战,解放台湾。

这时我们八兵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七团由安徽祁门剿匪转移到浙江建德地区,由建德地区出发步行到温州,此时已是4月了。由于部队对我的信任,把我从连队抽到二十五军特务团侦察营一连任副指导员。到达侦察一连不久,我第一个任务就是带一名通讯员单独到地方联系派船的任务。大概是5月份,我带一名通讯员到了平阳县的金乡乡公所。此地是福建边界,结果一只船都未派到,还打了一仗,返回部队。福建逼近台湾,福州到台湾基隆是150海里(即280公里)。部队步行到福建,我侦察一连担负着军后勤护航任务,从熬江乘机帆船从海上到福州。我侦察一连执行的第三个任务是,把福州机帆船厂造好的所有机帆船开到并停放在一个海湾里,我们派岗哨昼夜看守,每条机帆船上安装了两

* 王哲富,湖南醴陵人,1945年8月参加新四军,离休前为浏阳市石油公司副经理。

部发动机。6月上旬,粟裕向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报告了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情况,并请求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台湾战役。毛泽东同志宣布由粟裕负责此次战役。我第三野战军最初拟定以8个军参加攻打台湾,为了争取早日发起台湾战役,要求我第七、第十兵团加紧攻取舟山。金门登陆作战为台湾战役的实战演习。

此时,我军获悉台湾蒋军有可能招募外国雇佣军作战的动向,我三野领导迅速报告中央军委。当时台湾兵力约7个军,估计其战斗部队有13—14万人,如加上雇佣军,则台湾蒋军兵力应以20万人计算。因此我三野的8个军参战已不够,必须三野部队(淮海战役是16个纵队)参加,加后勤人员和特种部队需50万人。这样,我军对参战兵力做了第一次较大的修改。3月5日至5月1日,我第四野战军一部发起海南岛战役,歼敌3.3万余人,解放全岛。蒋介石鉴于海南岛的教训,集中一切兵力,确保台湾基地,决定放弃舟山。我军原拟定在沿海岛屿就地全歼国民党军队的设想未能全部实现,台湾防御得到了海南、舟山兵力的加强后,比原估计的20万人增加了一倍,约达40万人。敌情的这一变化,使我军原定以九兵团4个军为第一梯队的准备已不够强大。为此,我三野战军前委立即于5月17日作出新的部署,决定除九兵团照旧担任攻打台湾第一梯队外,同时命令七兵团充实第一梯队,这样2个兵团8个军20多万人。其余八兵团二十四军、二十五军及十兵团4个军分别担任第二梯队。这一新的部署是对战役兵力的第二次较大修改。

我部由浙江建德地区步行到福建,就是执行攻打台湾第二梯队的任务。6月23日,我三野根据蒋介石在台湾加紧补充和组织部队的情况,向军委报告:“敌陆军兵力在我军进攻时若达到50万人,为了彻底取得战役的胜利,我军假若能从其他野战中抽出3至4个军作为第二梯队,我预备队则胜利更有把握。”至此,我军三度修改战役计划,调集兵力达16个军以上,这样就大大加重了

战役准备的工作量,推迟了台湾战役发起的时间。由于我军一再增加台湾战役的计划参战兵力,使本来就比较少的舰船数量与实际需要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最近部队登陆的舰船不足,从而制约了台湾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这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对台政策由1949年8月后的袖手旁观转为直接武装干涉。国际形势的突然变化,客观上使我军同时面临着东北部朝鲜和东南部台湾两个作战方向,这既不符合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也为国力所不允许。10月19日,志愿军入朝作战。11月,原作为台湾战役第一梯队的第九兵团也奉命赴朝作战,我二十五军由福州步行到江苏无锡。当时正值炎热的天气,在此待命。至此,我军主要战略方向从东南部的台湾彻底转向东北部的朝鲜,作战任务也由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转变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了。